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思维定式的一些思考

叶自成

当前国内不少人在讨论国际战略或大战略问题，提出了不少观点。这些观点虽然也有不少启发和新颖之处，但我的总体评价是：由于国内学者大多受到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国际战略研究或大战略研究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因而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本文是在其中一些观点的启发下形成的对国际战略思维定式的一些思考。[1]

由于国内学者大多受到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国际战略研究或大战略研究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因而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一、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既有高明之处，也有重大失误

中国国际领域的研究过去受到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现在则受到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刻影响。国内许多人在翻译引进介绍欧美的研究成果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打开了国内学人的思路，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研究方法，其中最大的一个成果是国内国际研究普遍使用西方国际研究的概念和术语，中国的国际研究开始与欧美的国际研究接轨。

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局限性，总体上缺少对美国国际研究的反思和批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学者思考的视野，自觉或不自觉以美国国际研究的思维定式作为自己的范式，学习美国学者独立思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点不够，缺少中国学者本体的定位，用美国学者思考美国特色问题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特色的问题。这在国际战略的研究上也可反映出来。

1 这些文章包括王缉思：《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几点看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袭援平：《关于国际战略研究的几点看法》（载《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1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2007年5月28日）、梅然：《国际战略研究的对象和若干特点》（载《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2期，2007年5月30日）。王缉思《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对本文的形成尤有启发。

通常人们会认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成果很多，大师不少，思维活跃。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有那么值得中国人羡慕吗？有那么发达、灵敏和运筹的超前吗？其实不尽然。

在实践中，美国的国际战略有高明之处，这在与苏联争霸的冷战时期表现最为经典。美国的遏制战略、新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这一系列相互继承又不断向前推进的战略，在瓦解苏联的过程中发挥了全局性的关键作用。

但美国的国际战略也经常犯许多重大的错误，而这些错误通常被认为是不应该犯的。失去中国是美国“二战”后所犯的重大战略错误之一；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的失败也反映了其战略的失败；“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也是美国战略的重大失误；美国的对华战略在接触和遏制之间摇摆不定，经常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

美国国际战略其实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目标明确、手段高明、灵活和富有前瞻性，总体上评价可能也是好坏参半，并不值得人们那样羡慕。

所以，美国的国际战略固然有其成功的部分，但其实也有许多很失败的地方，也反映了美国国际战略其实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目标明确、手段高明、灵活和富有前瞻性，总体上评价可能也是好坏参半，并不值得人们那样羡慕。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失败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国际战略失败导致其政权的崩溃，萨达姆本人的生命也成了其国际战略失败的祭品，更给伊拉克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由于美国国家实力雄厚，经受得起战略失败的折腾，所以虽然其战略失败也使美国付出了较大代价，但总体上未能给美国以重大打击，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掩盖了美国国际战略失败的严重后果。

为何被人们认为战略文化发达的美国还会经常犯各种常识性的重大错误？人们会说，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有许多成果没有被采纳，因此美国国际战略的重大失误不等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的重大失误。这有一定道理，国际战略研究的学者们不能为国家国际战略的失误埋单和承担责任。但是，人们评价某种实用性很强的研究，总是会把它的有用性与实际被运用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在任何一个国际战略的研究上都会出现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方案，决策者们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如果决策者们最终选择的总是比较符合其利益的方案，说明其决策者有眼光而且研究者有水平；如果决策者们最终总是选择损害其利益的方案，说明决策者的战略思维有问题，也说明国际战略方案研究者的成果虽然正确但未能被采用，因而研究成果只具有学术和思想价值，而不具有实用价值，说明国际战略研究者们没能找到正确的影响决策者的途径，或者其说服力不强；如果国际战略研究的较为正确的成果总是不能被决策者采纳，则该国际战略研究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而国际战略研究的成果最终都是要以实践影响力来评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似乎也是好坏参半，既有像乔治·凯南那样的有眼光也

很幸运的研究者，他提出了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而且也被美国决策者所接受的遏制战略；也有像“二战”期间美驻华使馆谢伟思那样的有眼光却不走运的失败者，他虽然提出了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与中共保持接触的政策，但最终却被指控为亲共分子，不但其主张未被接受而且还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既有为美国的海湾战争提供有限目标的正确指导，也有在伊拉克战争中可能导致美国陷入第二个越南战争危险的失败的战略方案。如果要总体评价，也可以说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是好坏参半，也不值得人们在总体上大加赞赏。

二、国家安全并不是国际战略研究的唯一取向

很不幸的是，美国的这种总体上不能算是很好的国际战略研究的样式，却正在成为主导中国主流学者国际战略研究的思维定式。

这表现在，美国的主流国际战略研究的学者，不论是什么流派，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也不论是已经成功还是失败，是政府官员还是大学学者，几乎大多都以安全或与安全相关的重大问题作为国际战略研究的主题。因此，在所谓的国际战略研究的定义中，都把处理国家的安全或与安全相关的全局性或总体性的问题作为其主要界定。

中国的主流国际战略学者虽然可能批判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中的霸权主义倾向的内容，但对这种思维定式几乎不提出什么异议。比如，因为美国的大战略定义为国际战略，因此，一些中国学人也以此定义中国的大战略，认为中国的大战略就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或者，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不是一个学科，因此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也最好不叫国际战略学等等。最近，有研究者开始对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思维定式提出批评。如王缉思教授提出，美国的国际战略思维中的到处寻找敌人的思维、以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试图强行推广的思维，导致美国国际战略的重大失误。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不能重犯这样的错误。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但是，从深层次上说，美国国际战略的思维定式又是很深的。既使有意识地批评美国的国际战略思维的人，也可能不自觉地在这一思维惯性的影响下，继续使用这一定式。比如，有的学者虽然批评了美国国际战略思维中树立假想敌的做法，但却提出，国际战略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外部威胁问题。其实，战略假想敌思维也好，外部威胁也好，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外部威胁可能外延更大，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非国家，可以是有形实体，也可以是无形的东西），但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二者都可以互换。例如，美国说中国是美国的假想敌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外部威胁，没有区别。

问题还不在于是战略假想敌还是外部威胁，而在于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以安全为国际战略研究唯一取向的思维定式。只有安全思维定式才会把敌人或外

部威胁放在唯一重要的地位上。

因此，问题就成了以下这样一些很少人思考的问题：1. 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一定和只能讨论重大的国际安全问题吗？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安全问题，中国的国际战略也只能研究安全问题吗？除了国际安全问题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能进入国际战略的研究视野吗？美国的国际战略真的是和只关注安全问题吗？ 2. 为什么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特别关注安全问题？ 3. 美国的安全问题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

我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是：

第一，安全问题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或都应该是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问题，但它不应只是国际战略研究的唯一问题，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和应该有不同的关注问题。从逻辑上说，既然所有的国际战略都是反映国家利益的，而国家利益至少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如果所有的国际战略都以安全为取向，那么作为国家利益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利益岂不是与国际战略无关？因此，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既要有维护安全利益的战略，也一定要有维护发展利益的国际战略，否则这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就有问题；如果国际战略只与安全相关，不如就叫安全战略又何必称国际战略？美国的国际战略也并非都是安全战略或以安全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美国的所谓大战略中，其中孤立主义战略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执行时间最长的大战略”，[1]它不能说与安全无关，但安全至少不是这一战略的中心，因为这一战略的三个假设都不把安全放在首位：第一个假设是美国安全没问题，其他国家不可能攻击美国；第二个是美国的对外经济利益不需要美国在海外投放军事力量进行保护；第三个是过多部署军力不仅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没有意义，而且还有损美国的竞争力。[2]

第二，美国现在的国际战略特别关注安全问题，是由美国国家发展的特点决定的，其一，美国是发达国家，虽然也有发展问题，但总体上美国的发展问题并不突出，因此安全问题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重点；其二，美国是一个自命为世界领导的国家，因而维护其国际社会的地位和权力，维护和扩张其霸权就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如何处理和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国际挑战和难题就成为其国际战略的主要内容。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着极为艰巨的发展任务，就无法把国际战略完全界定为安全或与安全相关的问题，而必须把国家的发展作为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

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着极为艰巨的发展任务，就无法把国际战略完全界定为安全或与安全相关的问题，而必须把国家的发展作为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的国家利益体系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定了现阶段国家的发展利益是第一位的，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

1 [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2 同上书，第222—223页。

研究也要以发展利益为重要内容，仅仅研究什么是中国发展的主要威胁还不够，还必须对中国如何在国际环境中进行发展、实现发展目标进行总体谋划。

实际上，中国的许多对外行动都反映出安全与发展兼顾，有些甚至是发展高于安全的特性。比如，中国在中亚的活动，既有安全方面的战略考虑，也有能源发展的战略考虑；而中国在非洲、拉美、澳大利亚等区域的活动，安全方面的考虑就较少，但对中国的资源能源方面的发展却较有战略意义。

第三，美国任何对外的行动都自称是为了美国的安全，但其实有些并不是真正的安全问题。比如，“9·11”事件表明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将来一段时间也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因此，美国的反恐战略的确与美国的安全相关。但是，美国的安全问题也有不少是假命题，即那些被认为是美国的现实、可能和潜在的威胁的，并非是美国真正的威胁，美国界定的威胁太随意。比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主要的两条都站不住脚：说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勾结被证明是无中生有的，说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是没有根据的。因此，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安全其实是个伪命题。这就涉及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即如何界定安全与威胁？一个国家实行的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因而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构成威胁，因此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应当对这些国家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封锁、遏制以改变这个国家的制度，诸如这样的安全逻辑在美国的安全战略中一直存在，但这其中有多少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问题？

因此，尽管每个国家都必须关心其安全问题，但安全问题不应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战略唯一关注的问题。

三、国际战略研究是国际上外部的研究，但不能与国内的重大问题切割开来

国际战略研究的视野当然是外向的，是国际上和外部的，这没有问题，如果它是国内的，那就不叫国际战略了。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这样内部问题很多的国家，又不能把国外与国内完全切割开来。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国内与国外、政治与经济越来越具有相对性，纯粹的国内问题大量存在，纯粹的国际问题也有之，但越来越多的国内问题与国外问题是无法切开的。例如，中国的对外经济问题是有关外部的问题，又是内部问题，内外完全是一体化的，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何要把外贸部与内贸部合并成一个部；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又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都绕不过去；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但中印关系、中欧关系绕不过去；环境保护是国内问题，但其中许多方面具有国际性质。

国外威胁对中国国内的影响虽然有所降低，但是，中国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

的联系大大增加，既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又凸显了中国国内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国内政局相对稳定，但似乎不能说比建国初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要稳定；国内在改革开放时期积累的矛盾在增加，又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问题。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口众多，文化多元，东中西部区域差别大，社会贫富不均的差距在拉大，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国内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等，这些都是中国安全的重大隐患。在来自国外的安全威胁有所缓和的情况下，国内的安全因素显得更加突出，完全可以说，中国安全威胁的主要因素在国内，能够造成中国国家利益重大损害的主要因素在国内，国内安全威胁因素大于国外安全威胁，因此，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因分工不同，可以把重点放在应对外部和国际威胁的研究上，但必须始终把解决国内的重大问题考虑在内，不可能完全与国内问题切割开来，有些方面可能是国内国外同等重要。任何战略研究的本质特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是研究和解决战略问题的，战略问题即是本单位、本部门、本领域、本国重大的突出的全局性问题，而当前中国的战略问题，十之八九是国内问题或与国内战略问题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很难绕开国内问题。所谓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两个大局的说法并不准确。中国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两个中心，又何来两个大局？中国只有一个大局，就是国内大局，所谓国际大局只是国内大局在国际事务上的延伸，是服务于国内大局的，如果说中国这个全局有十个部分，那国内部分是九，国际事务只是这个局的一。没有一，这个局不全，但一与九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说中国这个全局有十个部分，那国内部分是九，国际事务只是这个局的一。

这和美国不同。美国的国际战略带有全球霸权性质，其涉及的范围和领域相当广泛，因此美国的国际战略也可以称为所谓大战略，而美国的国内问题、发展问题虽然也不少，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口比中国少，总体资源和人均资源比中国丰富，政治制度长期稳定，法制健全贪污腐败不严重，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没有中国那样悬殊，社会保障体系发达，经济发展程度高，科技领先，教育发达，本来就是移民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很高，没有“三农”问题，也没有粮食缺乏的问题，因此，美国的国内问题相对中国而言是少之又少，但国际问题却相对突出，较中国而言是多之又多。因此，美国这个战略全局，国际部分没有五六、四五也有三四，比重相对较大，因此美国的国际战略可以称为大战略，总统花很大精力处理国际事务，处理国际事务的国务院、国防部的地位也很高，仅次于总统。因此，中国的国际战略绝对不能说成像美国那样的大战略，它只是中国大战略体系中的一个子战略。

美国这个战略全局，国际部分没有五六、四五也有三四，比重相对较大，因此美国的国际战略可以称为大战略。

中国国家安全威胁的一大变化是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突出。而在这一方面，与

国内的因素就很难分开。比如，能源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在有关能源的国际战略的研究中，当然要把如何保护中国的能源运输安全作为重要目标，但这远远不够，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拓展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开发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外寻找更多的油气生产开发的渠道的问题，油气发展的重要性超过能源安全运输的重要性，能源需求刚性矛盾是现实的，已经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形成现实的制约；而能源运输目前还基本上处于安全状态，并没有现实的重大障碍影响能源通道的顺畅，只不过存在潜在的重大隐患；同时，中国的能源战略又不能局限于能源拓展和能源运输安全，必须把节能和开发可持续的新能源作为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有国外因素（利用、引进国外节能、新能源的技术、资金、人才、国际合作等），也有国内因素，但没有国内外因素的结合就很难实现这一点。

实际上，中国已有的许多战略都是内外结合的。如对外开放，如果按照国内学术界的定义，它可能算不上国际战略，因为它针对的主要不是安全问题，也不是纯粹的“国际的”和“外部的”问题。但它又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对中国的国内国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重大影响。这一战略包括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国内部分主要指各地区部门领域的开放、搞活和与国际接轨，国外部分主要指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和利用国外市场，没有对外开放的国内部分，对外开放的国外部分就会流于空转，没有对外开放的国外部分，国内的开放就没有实际内容，因此，二者的结合使得这一战略得以顺利实现。因此，对外开放既是国内战略，也是国际战略。

当然也不是说全部和所有的国内问题都应包括在国际战略的研究中，但大体上可以把国际战略分成三种类型：即纯粹的国际和对外的、与国内因素有一定联系的、与国内因素密切结合的。

四、总结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经验教训与发掘中国战略文化的精华结合

毫无疑问，国际战略研究有共同性，因此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国际战略研究的经验教训是很重要的，但必须知道外国的战略文化再好，也是外国历史文化与外国实际情况结合的产物，对于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国情的中国来说是有很大局限的。因此，总结中国已有的国际战略的经验教训，发掘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是大有必要的。

我认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已经有四个比较成型的国际战略，它们各有特点。

20世纪50年代的对苏“一边倒”战略。它的特点是：突出主要矛盾，利用美苏矛盾，通过与苏联的结盟来对抗美国的遏制，内外兼顾，既应对中国的主要

外来威胁，又解决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生存、安全与发展三大利益完美结合，它的目标明确，手段多样，目标定位和手段的使用符合中国的实际能力，敌友界限分明。从其实施的结果来评价，虽然有不少副作用，但成效显著：保卫和巩固了新生的政权，对外与苏联东欧集团实行紧密的联盟，全方位对苏东集团开放，对内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学习、引进、模仿其制度、人才、经验、资金；从无到有形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初步的国民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缺点是友我不分，意识形态挂帅，国家利益观念不强，独立自主原则未能很好体现，照搬苏联经验太多，形成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其后遗症至今仍存。但总体上说，它仍不失为中国大战略的经典之作。

20世纪60年代反对美苏的“两条线”战略。它的特点是：敌我分明，突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大限度地依靠本国力量解决本国的问题，反对外来威胁，国家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其成效是自我研发成功“两弹一星”，大大扩展了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影响。但总体上这是一个失败的战略。它树敌太多，不仅美苏两霸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不少国家领导人也被中国按意识形态站队，成了各国反动派，也是中国反对的对象，中国与美国、苏联、日本、印尼、印度等国关系交恶，实际上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中国走上了较封闭的发展道路。两条线战略是国内“左”倾错误在对外战略上的延伸。这一战略设定的目标大大超出中国的实际能力，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力量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由于把过多的有限资源浪费在备战的过程中，中国的整体发展滞后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拉大了。

20世纪70年代的联美反苏战略。这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战略而不是一个大战略，它的特点在于改变和纠正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的错误，突出中苏这一主要矛盾，利用美苏矛盾，通过与美国的结盟来缓和苏联的压力。以意识形态挂帅的战略开始向突出国家利益的战略方向调整和过渡。这一战略的一大收获是改善了中美关系，为后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外交上的基础。但它的效用远远比不上“一边倒”战略。

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和平发展战略。它的总体目标是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基本建成现代化的强国。它是一个大战略，形成了一个战略体系，包括了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既是国际战略又是国内战略。在宏观层面上，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提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争取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等思想，并具体提出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独立自主与不结盟、多极化、一国两制、政治经济改革、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中观战略，在实践中这些战略又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如对外开放战略，经历了三个特区开放、沿边沿海开放、内地开放的大开放格局，也经历了从“请进来”战略到“走出去”战略的变化等。近30年来，和平发展战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战略指导性作用。今后这一大战略还将起

到巨大的作用。

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虽然它是中国唯一一个得到完整表述的国际战略，但我认为它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实践中几乎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的战略。它的内容是20世纪60年代“两条线”战略的深化。这一战略提出的最好时机应当是60年代，而它到70年代中期才正式提出并形成，但这一时期中国形成联美反苏的战略并在实际中发挥作用，“三个世界”的战略与之形成较大的矛盾；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不仅反美反苏不用，就是联美反苏战略也变化为与美发展关系和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思想，之后冷战结束，两霸中的一霸苏联消失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更加不合时宜。只有其中的与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反对霸权的合理思想，在邓小平的和平发展大战略中得到了继承。

总起来看，中国的国际战略没有太大的失误，可能比美国同期的国际战略所犯的错误还少些和小些。因此，中国国际战略的研究，大不必扬美抑中。

总起来看，中国的国际战略没有太大的失误，可能比美国同期的国际战略所犯的错误还少些和小些。

从上面几个战略的总结可以看出一些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思维特点。一是国际战略研究以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和时代发展的特征为前提，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才能形成好的国际战略；二是中国的国际战略不仅要研究安全问题，也要关注中国的发展问题；三是国际战略不仅要研究国际问题，也要研究国内问题。除“两条线”战略外，其他三个战略都较好地做到了第一点，“一边倒”和“和平发展”战略很好地体现了后两点。

同时，还要注意到，中国是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国家，在战略文化方面也有深厚的积淀，这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个有待开发的资源。在这一方面，有几点值得思考：

其一，天下一体、内外一体的宏观思维。孔子和老子的哲学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有其共同的内容，即都主张天下一体、内外一体。孔子的身—家—国—天下观，老子的身—家—乡—国—天下观，都认为天下的问题和国家的问题不能截然分开，必须联系起来考虑。战略是高度宏观性的问题，这一特点可以得到发挥。中国是一个大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小天下，或者大天下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许多事情都具有国际性，你可以不谈，但他国却偏要和你谈，不如我们主动地把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其二，战略也是高度综合性的。一谈战略，人们很容易把它分解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对美—对俄—对欧—对日、战略目标—手段—方式—评估等，这种分开来看的思维有其长处，就是容易深入，但短处却可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人们可能分别知道对美战略和对俄战略，却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对外的总体战略，即使把对美战略和对俄战略加起来，也不一定是

中国的对外战略。西方人的思维总体上擅长于分开来分析的科学方法，也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而中国人思维的长处却是合起来想的综合和总体思维方式。这种区别好比西医与中医。西医治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治病的基本方法却是从气血、经络、寒热等看起，头痛的问题有可能通过治头来解决，也可能通过足底的穴位来治。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但从战略来看，可能这种综合的总体思维应当更有益些。

抓住主要矛盾和利用外部矛盾可以说是中国战略思维的一大传统。

其三，抓住主要矛盾和利用外部矛盾。中国历史文化中积淀了许多谋略学的内容，在实践中也常有运用。在战略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和利用外部矛盾可以说是中国战略思维的一大传统。苏秦的合纵与张仪的连横，以夷制夷，东吴连蜀抗魏，近代的联俄制日或联日制俄，以及联苏反美与联美反苏，都是这一思维在中国战略方式的经典体现。它虽然简单却比较见效。

总之，在学习和借鉴美国国际战略的经验教训时，中国的内外一体、综合分析、分清矛盾主次、安全与发展结合的思维，也是值得我们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坚持和发挥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